

论曾珣的巴蜀情怀及其对巴蜀文化的贡献

林家骊 李敏¹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杭州 310028)

【摘要】: 巴蜀才子曾珣乃明代正德、嘉靖年间著名诗人,其博通群经,诗名早著,少与杨慎齐名,又与杨慎、王阳明、郑善夫、何景明、王廷相等名流交游甚密。由于曾珣诗文多散佚不存,其才名淹没已久。其诗文集《少岷先生拾存稿》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得以存世。曾珣诗歌多描写巴蜀山水,关怀巴蜀民生,友爱巴蜀朋辈,推崇巴蜀先贤,表现出浓厚的巴蜀情怀。其文章记录了许多巴蜀历史、书院建设与文学著述活动,为研究明代巴蜀文化与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对巴蜀文化有重要贡献。

【关键词】: 曾珣 《少岷先生拾存稿》 巴蜀情怀 文化贡献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9)02-0168-07

巴蜀才子曾珣乃明代正德、嘉靖年间著名诗人,其博通经籍,工于诗文,兼善书法,“少与杨用修(杨慎)齐名”^{[1]2583},又与杨慎、王阳明、郑善夫、何景明、王廷相等名流交游甚密,为“莫逆交”^{[1]2583},才名著于当时。然由于曾珣著作多散佚不存,故才名淹没已久。其诗文集《少岷先生拾存稿》(四卷,现存三卷,第四卷及附录《司徒大事记》一卷散佚)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得以存世。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出版,为曾珣研究提供了便利。目前学界对曾珣的研究甚少,仅有杨钊《杨慎、曾珣交游考》^[2]、吕红光《曾珣其人及其诗歌考论——兼论曾珣与杨慎诗歌的异同》^[3]两篇文章对之关注,其研究还有较大空间。考其诗文,其中多有描写巴蜀山水、关怀巴蜀民生、友爱巴蜀朋辈、推崇巴蜀先贤之作,表现出浓厚的巴蜀情怀,并且其中有大量关于巴蜀历史地理、书院文化及著述活动的记载,对巴蜀文化具有重要贡献,为研究明代巴蜀文化与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值得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

一 曾珣其人及其巴蜀性格特征

曾珣的生平事迹,散见于《明史》、张佳胤《中宪大夫江西建昌府知府少岷曾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张佳胤《墓志铭》”)、郭子章《中宪大夫江西建昌府知府曾少岷先生祠堂碑并序》(以下简称“郭子章《祠堂碑并序》”)、董复亨《少岷先生拾存篇序》、章懋《选少岷先生拾存稿序》、韩忘《少岷先生拾存篇小序》及诗话等,其中多有抵牾,稍作考辨。

(一) 曾珣的名、字、号

曾珣之名,张佳胤《墓志铭》、郭子章《祠堂碑并序》、《明史》(卷二百七十三)、《明诗综》、《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续通志》、《续文献通考》、《静志居诗话》等作“曾珣”,而《千顷堂书目》(卷九、卷二十二)、《明史》(卷一百三十四、卷一百三十七)、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等作“曾屿”。曾珣《〈乐府余音〉序》一文中有“始浙东王石泉先生驻节雪山,召珣讲学”^{[4]260}之语,可见其名当为“曾珣”。“珣”、“屿”形近而误。

¹作者简介:林家骊(1951—),男,浙江温岭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古籍整理工作;

李敏(1979—),女,苗族,贵州遵义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魏晋南北朝文学。

关于曾琦的字,张佳胤《墓志铭》、郭子章《祠堂碑并序》等作“东石”,《千顷堂书目》、《明诗综》、《四库全书总目》等作“东玉”,《光绪泸州直隶州志》卷九《人物》:“曾琦,字东石。”小字注云:“旧志误作东名,《明诗综》亦作东玉。”^{[5]617}考曾琦朋友诗文皆称之“东石”,如杨慎有《赠曾东石》诗,郑继之有《答曾东石正郎》、《答曾东石太守》诗,可见“东玉”、“东名”皆误,其字当为“东石”。

关于其号,张佳胤《墓志铭》载:“武宗朝,吾蜀数君子者起,咸尚文章气节,而江阳少岷曾公其一也。”^{[1]4609}又云:“公应聘往,因登大岷、青城诸山……胸中吞吐八九而叹曰:‘大岷之外可称配林,孰与吾家安乐?’日相从几席间也,遂易安乐为少岷山,因自号云。”^{[1]4609}记其号“少岷”,并交代其号源自少岷山。在他与朋辈的诗文中,有“少岷”之称,又有“岷野”、“少岷山人”之称。如杨慎《鹧鸪天·以茉莉沙坪茶送少岷》、《岷山高寿曾少岷》等称之“少岷”;而杨慎《寿岷野曾年丈并序》又称之为“岷野”,曾琦在《与升庵杨太史、培庵刘中丞联句》诗末有“右饮岷野”^{[4]246}的标注,其《蜀邛都前兵宪方冈胡公政绩碑记》自云:“闻江阳岷野人者,好古不佞,正直是与。”^{[4]284}《三在草堂记》一文中,他又自称“少岷山人”,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集部二十九著其号“少岷山人”。可见曾琦号“少岷”、“岷野”、“少岷山人”。大概他早年号“少岷”,晚年解职归乡后又号“岷野”、“少岷山人”,取岷山之野人之意。

(二) 曾琦的籍贯与经历

曾琦的籍贯,《千顷堂书目》载曾琦为“泸州人”。而《明史·艺文志》载曾琦为“忠州人”,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百八、卷一百九皆列“曾琦”,一作“重庆人”,一作“泸人”,所叙事迹皆与张佳胤《墓志铭》相合,应为同一人。而张佳胤《墓志铭》对其祖籍变迁记载较详:“自江西徙河南,再徙麻城,入蜀,家于江阳,为河西公,是为蜀之始祖。”^{[1]4611}其当为四川泸州江阳人。由于泸州与忠州在地理区位上极近,历史上,泸州曾属重庆路,上属四川,忠州亦上属四川,故而有此讹误。曾琦《发江阳次王凤巢韵二首》云:“山丘违昔步,水乡计初程……仙客赠嘉言,亲朋酌深觥”^{[4]222},叙述他初次离开家乡江阳漫游的情景。而《入江阳境》曰:“江阳之水兮锦浪,江阳之山兮岷峨与通。自我别兮三年,寄心想兮飞鸿,归来兮如何?”^{[4]218}抒发他辞官归乡的心情。可见他是泸州江阳人无疑。曾琦的生平经历,张佳胤《墓志铭》记其生于明宪宗成化庚子年(1480),卒于嘉靖戊午年(1558)。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举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及第,授户部江西司主事。以清正廉明忤逆刘瑾,转员外郎中,条陈税政,又转为建昌知府。遇宁王宸濠叛乱,献策以擒王;又收复九江南康,功勋卓著。后为流言蜚语中伤,弃官归隐泸州江阳,购置茅斋数楹,以藏书著述为快。

综上所述,曾琦字东石,自号“少岷”、“岷野”、“少岷山人”,江阳(今四川泸州)人。江阳地处巴、蜀之间,《华阳国志·蜀志》云:江阳郡“东接巴郡,南接牂牁,西接犍为,北接广汉”^{[6]289},其下“江阳县”条校注云:“西汉旧县,原属巴郡。”^{[6]291}可见江阳旧属巴,汉以后属蜀。由于地处巴蜀之间,江阳享有巴、蜀文化的共同特点。巴地因山川阻隔,地势险要,民风较为彪悍。《华阳国志·巴志》云:“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6]28}蜀地则地势平坦,物产丰饶,人民富裕,“多斑彩文章”^{[6]175},盛产文人,历史上有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陈子昂、李白、苏轼等著名文学家。曾琦生活在巴、蜀之间,深受巴蜀文化的交融濡染,他性情耿介,“尚文章气节”^{[1]4609},从小学习圣贤群经,诗名早著,“七岁侍封公山阳茅屋,见隙光,曰:‘此何故哉?’‘其野马丈虹耶!’封公异而诘之:‘儿能对乎?明透屋山光似玉。’公应声曰:‘影浮书案气如龙。’封公益奇之。十四岁补博士弟子,每试辄高等”^{[1]4609}。入仕为官清廉,爱惜民众,建书院,敦教化,为百姓所称,在江西建昌有祠堂供奉。归隐江阳后,“公敦朴无华……与人真诚直易无他肠”^{[1]4611},宗族多赖以生存,常急人所需,章懋说他“至性刚中,法言排募,澡身自洁,疾恶如仇”^{[4]207}。卒后,乡人与弟子私谥“文节先生”,以誉其高节。曾琦的一生,表现出巴蜀人重视文学、博学多才、敦厚好义的典型性格特征。

二 曾琦诗歌中的巴蜀情怀

曾琦的诗歌,《少岷先生拾存稿》卷一收录 221 首,内容包括山水描写、唱和赠答、感时抒怀等,其中多与巴蜀人物、文化有关,表现出浓郁的巴蜀情怀。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描写和赞美巴蜀山水

在曾琦的诗文中,有很多描写巴蜀山水的作品,故乡的山水滋养着诗人,诗人用一双赞美的眼和一支多情的笔表达对故乡的深情。曾琦因喜爱岷山而以为之号,在其诗歌里,他尽情地描写着巴蜀大地的雄奇壮阔、清丽灵秀,巫山、巫峡、峨眉、青城都在其笔下各展情态。在巴蜀山水中,峨眉山、青城山是最有代表性的景观,曾琦反复对它们进行歌咏,《游峨眉歌》、《入岷山至青城》、《登峨眉山》、《江上望三峨》、《登峨眉绝顶》、《经八十四盘》、《别峨》等,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描写刻画。在《游峨眉歌》中,诗人倾情表现出对峨眉山的倾慕、赞叹之情,他说自己游岷山时,远远看到雄伟奇峻、郁郁葱葱的峨眉山,令他激动兴奋,魂牵梦绕,“归来几度驰清梦,今到峨眉梦如醒”^{[4]223},带着这种痴狂,诗人沉醉在峨眉山的美景中。山峰之险峻、水势之雄浑,林木之葱郁,山花之烂漫,构成了一幅仙境般奇伟瑰丽的峨眉山图画。而《江上望三峨》再次展现了作者的期待之情:

眉宇清寥外,相看意甚投。三峨贤伯仲,容我少岷游。^{[4]243}

作者于江上远观峨眉,山峰耸立,高出云天,其雄壮之势深深吸引着诗人,与诗人意甚相投,激起诗人畅游的愿望,诗歌最后两句大有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7]1035}的豪情和气势。终于可以一展夙愿,诗人《登峨眉山》:“顾瞻已觉三川小,森爽仍惊六月寒”^{[4]239},其高峻之势突显。待日开云散,千岩竞秀,鸟语悠悠,令人忘记尘世纷繁,洗涤胸襟。一步步走来,《经八十四盘》:

白云绕盘盘,青霞萦步步。冷然生羽翰,不是人间路。^{[4]243}

峨眉山云蒸霞绕,宛如仙境,幽深的树林、清凉的空气,让人感到冷冽。八十四盘道路萦纡曲折,置身其间,仿佛身披羽翼的神仙。短短二十字,把峨眉的高、奇、险、峻以及诗人历险的快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经过艰辛的跋涉,终于到达山顶,《登峨眉绝顶》“峨眉七重天,云梯直上上。到顶不呼僧,独立观万象”^{[4]243},仿佛进入七重天,不为拜佛求僧,只为独立山巅,一览天地万象。要离开了,诗人又是多么不舍,《别峨》“横道竹枝垂,留人莺语啭”^{[4]243},连竹枝、黄莺都挽留诗人,不舍离去。

诗人通过对峨眉山从远观、游览及离别一系列的活动描写,展现了峨眉山雄奇俊秀的美,表达诗人对峨眉山水的热爱。即使在宦途,巴蜀山水也成为诗人魂牵梦绕的想念,他在《中秋漫兴》中说:“颇忆蜀南山阁外,千峰寒耸鹤声遥。”^{[4]239}《游中方寺和两山二首》中说:“梦入岷峨山色好,春深洞口碧萝悬。”^{[4]245}这一忆一梦,表现出诗人对故乡山水的无限牵挂和热爱。

(二)关怀巴蜀民生疾苦

曾琦诗歌中有反映巴蜀战乱、百姓遭遇大旱、生活困窘的内容,表现出作者关怀巴蜀民生疾苦,渴望人民和平安宁、生活幸福的愿望。《平珙雅并序》反映的是嘉靖十年(1531)平定珙州流民之乱事。四川东南播州境内有珙州,与重庆接壤,地势险要,为流民逃犯聚居之地。珙州民风彪悍,常侵扰、掠夺重庆民众。嘉靖十年秋天,“珙贼焚诸邻,聚夺攘矫”^{[4]216},四川巡抚乃整师征讨,斩获群凶。曾琦因作雅歌以扬其声威,颂其功绩。其又有《〈平真纪实〉序》,所序之事与《平珙雅并序》相合,“真”即“珙”,取其同音。序文云:“至是逼我城邑,焚劫我村聚,虔刘我人民,凶焰益张。既勤告谕祸福,但以诡辞缓我,出没如故。”^{[4]271}描绘了乱贼嚣张的气焰和人民备受掠夺的苦难,展现其对乱贼的憎恨、对人民深深的同情,和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渴望。

《饶歌曲并序》反映的是嘉靖十二年(1533)平定蜀羌之乱事,诗云:“黠首要赏,梗我道途。凭危下石,突如纷如。兵威既扬,群丑悉遁。千公红压,蔚有美荫。小大溜口,蛮烟静静。树垣复堡,则莫我敢近。”^{[4]219}蜀羌作乱,掠夺财物,逼迫民生,故蜀出兵剿灭,在颂扬天兵神威的同时,表现出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

巴蜀曾遭遇大旱,在曾琦的诗歌中也有所反映,并表现出他对百姓疾苦深切的同情和关心。如《渝州喜细雨二首》(其一):

巴蜀频年曠,今年曠又新。三农泪欲尽,四月雨初匀。江鹤鸣堪喜,云帆湿不嗔。亦知秧已老,迟种胜全贫。^{[4]231}

巴蜀频频大旱,而此年旱情更为严重,使得农民苦不堪言,终于等到雨露降临,百姓一片欢喜,连鸟儿的鸣叫听起来也如此欢快,即使是自己的船帆淋湿难行,诗人也全无恼怒。农民的秧苗已老,但是迟种一些也胜过毫无收成。诗中充满了诗人对农民的同情和雨水降临的欣喜之情,“泪欲尽”道尽了农民的痛苦,也饱含作者对民众的怜惜,而一个“喜”字则把诗人内心的欣喜和盘托出。

《饥民篇和韵》则似《渝州喜细雨二首》的续篇:

六月不雨百谷稿,南山打龙北山祷。虽有根菱向晚生,又值秋霖成腐草。泥中摘穗釜中焙,三日中间一日饱。燃眉势急可奈何?出门乞贷意蹉跎。里中富室犹思患,市上贫儿待价多。皇天生我俱在世,赋命不同理则那。呜呼!饥来饥来不可忍,侧身北望恩波迥。^{[4]226}

经历大旱后,好不容易迎来雨水把庄稼种下地,可大旱仍在继续,等到秋天收获的季节,却又秋雨浸淫,无法收割,庄稼变成腐草。农民拾穗解饥,无法生活,只好出门乞讨,流离失所,读来字字血泪。诗人对巴蜀民众的艰辛充满同情,展现出诗人体恤百姓、忧怀苍生的胸怀。

(三) 乐与巴蜀人物亲近、友爱巴蜀朋辈

曾琦喜爱交游,除了与当时名流杨慎、何景明、王廷相等相从友善以外,门下还多门生弟子,“公亦接引后进,谈学术经济,洒洒有致”^{[1]4609},从其《九子篇赠门生诸进士》诗看,曾琦与他们乃师友关系。而其朋辈中以巴蜀文人为多,杨慎、张佳胤、熊南沙、章懋、徐东岩、张宪长、刘培庵等皆巴蜀人士,他或与之结伴行吟,相邀山水,诗文往复,或指点迷津,引导学问,或鼓励关怀,加以爱护,表现出对巴蜀人物的亲近和喜爱。

杨慎乃四川新都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8]5089},他与曾琦为乡试同年,感情笃厚,晚年因“议大礼”忤逆明世宗,贬云南永昌,永世不得录用,后寓居泸州江阳。曾、杨二人感情笃厚,张佳胤说:“杨用修白首戍滇,欲归蜀为首丘计,乃不归新都而卜宅江阳,以就公相与赆酬甚盛。”^{[1]4610}认为其居于江阳是为了与曾琦交游。他们相邀行吟,遨游山水,诗文往复,杨慎有《赠曾东石》、《曾少岷谈麻姑山之胜,遂续其句》、《资江渡归续少岷句》、《玉蟾寺次年丈少岷曾公韵》、《曾少岷惠忠州新琢云根笔》、《怀少岷》、《宋园赏花即事次少岷韵》、《六月立秋日曾岷翁邀金井玉池两庄观莲》、《以沙坪茶送曾少岷,并忆白乐天睡夜茶兴寄杨慕巢诗,遂成四韵》、《次韵岷翁双鹤来翔》、《答少岷》、《少岷雨后棋会》、《少岷饮客文昌宫,折古花见寄韵》、《金衣公子·少岷翁送荔枝》、《寿岷野曾年丈》等20多首诗歌赠曾琦,曾琦有《和升庵中秋待月》、《题升庵扇二首》、《与升庵杨太史、培庵刘中丞连句二首》、《寿大司寇喻月梧年丈和升庵韵》等与之唱和,诗歌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赏花、赠物、下棋、游玩、连句等活动,表现出二人交游之密切,感情之深厚。

张佳胤乃蜀人,其在为曾琦所作《墓志铭》中有“吾蜀数君子者”^{[1]4609}语。曾琦卒后,张佳胤应其子请求,欣然为之作墓志铭。他又有《大观台远眺同曾少岷太守、杨升庵太史、朱芑山少参、熊南墩、董豸屏二进士》诗,叙述他与曾琦、杨慎等遨游山水、交游赋诗的友情。

章懋在《选少岷先生拾存稿序》曰“吾乡少岷先生”^{[4]207},其与曾琦乃同乡,并言:“余于先生岂知言哉?先是余屡试南官,弗售,乃东稿括帖就正先生。”^{[4]207}二人乃师友关系,曾琦对其学问、文章多有指点。杨慎《次姚凤冈玉蟾寺韵约曾少岷、章后斋(懋)同游》诗,表现他们一起遨游蜀中山水、作诗唱和的风雅活动。

刘培庵,即刘彭年,字惟静,重庆璧山人,明正德九年(1514)进士。曾琦、杨慎与之交游,有《与升庵杨太史、培庵刘中丞联句二首》,曾琦还为之作有《培庵记》,颂其学养品性。

另外,曾琦有《送徐东岩谏礼罢归》云:“锦水春来添浩荡,峨眉秋入倍嶙峋。”^{[4]239}从诗意上看,徐东岩也是巴蜀人,诗人送他归蜀,竭力勉励他谏礼的正直行为。《西浦吟为张宪长》云:“西浦在西蜀,湜湜澄且鲜。上有嶰溪竹,竹下苍玉泉。嶰竹入萧韶,玉泉洒钧天。”^{[4]222}以嶰竹、玉泉喻张宪长,云其为西蜀人。《赠顾颐斋学宪入口庆》“瑶亟出西方,冉冉趋北极”^{[4]222}云云,以出西方之琼瑶喻顾颐斋,似顾也是蜀人。

(四)推崇和师法巴蜀前贤

曾琦热爱巴蜀灿烂的文化,对前贤充满敬仰,在诗文创作中以之为榜样,加以学习效仿。董复亨在《少岷先生拾存篇序》评价其诗歌云:“概先生之大全,古歌在灵均廊庑间,杂曹植、傅奕;四言出《常武》、《江汉》;五言古学陈伯玉,时出入六朝;七言古诗视老杜;五、七言律几夺王、孟之座;五、七言绝,太白以后遂无敌手。”^{[1]2582}评价虽有所拔高,但可以见出曾琦在诗歌中有意师法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陈子昂、李白乃巴蜀人,杜甫虽不是巴蜀人,但与巴蜀有难以分割的关系,他晚年辞官后,长期寓居成都,在那里写下很多著名诗篇,他已成为巴蜀文化的一部分。

曾琦喜欢杜甫,在其诗歌中有和杜诗及学习、化用杜甫诗句之处。《自夔出峡用少陵韵》、《月夜泊黄草峡和杜》、《长至偶和杜》等是和杜之作,而其《七十感怀百二十五韵》、《丁卯六月过嘉州游凌云寺》和《武昌谢周宪长》等也有意师法杜甫五言排律。化用杜甫诗句的如《山行漫兴》:“高林恰恰莺声啭,近路依依柳眼明。”^{[4]239}化用杜甫《江畔独步寻花》:“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7]1128}《送同年杨石云使徐州》:“海岱云霞荡尘垢”^{[4]225},化用杜甫《望岳》“荡胸生层云”^{[7]1035}。曾琦对李白的诗歌也多化用,如《饥民篇和韵》“饥来饥来不可忍,侧身北望恩波迥”^{[4]226},化用李白《蜀道难》“侧身西望长咨嗟”^{[7]775}等。曾琦在诗歌创作上以陈子昂“风骨兴寄”的理论为指导,继以杜甫“清词丽句必为邻”^{[7]1128}的语言标准,追求醇厚雅致、清新脱俗的诗风,如《晚过西山》:

皓月迟迟度远林,素华冉冉浸寒襟。野僧邀入云边寺,卧听流泉响玉琴。^{[4]244}

皓月当空的夜晚,诗人应山中僧人的邀请来到西山云边寺。山间素净的花儿静静开放,在月光下越显显得洁白。在这空灵寂静的山中,诗人躺在叮咚作响的泉水边,耳畔又传来悠扬的琴声,高雅而又惬意。诗歌因诗人之兴而发,情感自然贴切,山间的空灵寂静与泉水、琴声映衬,动静结合,视听交融,营造出一幅高雅别致、清新脱俗的意境。朱尊彝以“清脱无尘气”^{[9]277}评价其诗歌,甚为准确。

综上所述,由于曾琦对巴蜀山水和文化情感深厚,所以在诗歌中大量描摹和赞美巴蜀风光,表现对它们的热爱;并且关怀巴蜀民生疾苦,同情其遭遇,渴望他们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与巴蜀人物亲近,表现关切友爱之情;敬仰巴蜀先贤,以之为榜样师法学习,以此展现出曾琦浓郁的巴蜀情怀。

三 曾琦对巴蜀文化的贡献

曾琦一生著述颇丰,据张佳胤《墓志铭》所录,其著有《圣学会通》、《河图洛书解》、《春王正月考》、《历代史评》、《论心学》、《论乐律》、《论数学》、《论气化》、《名和录》、《川东志》等,《明史》卷一百三十四载其著《计部大事记》,韩志《少岷先生拾存篇小序》曰:“先生别有补订《经史会通》。”^{[4]209}然而皆已散佚,《少岷先生拾存稿》卷二、卷三分别保存其序41篇,碑记31篇,内容涉及巴蜀历史事件、著作编撰、书院建设等,为研究明代巴蜀历史变迁、地方人物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对巴蜀文化有重要贡献。

(一)有关巴蜀的历史事件

《少岷先生拾存稿》所记历史事件,主要有巴蜀战争、官员的任职以及巴蜀民风 and 地理历史变迁情况。

《〈平真纪实〉序》记录了嘉靖十年(1531)川东有真之役,这在其诗歌《平琛雅并序》中也有记录,前已提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二总集类存目二有《秉忠定义集》条曰:“不著编者名氏。嘉靖十年,都御史宋沧巡抚四川,平真州剧盗周天星等。时同官于蜀者作为凯歌、露布等篇,汇成一书,以纪其事。其名《秉忠定义集》者,盖取世宗所赐玺书有‘秉忠定义,条奏肤功’语也。”^{[10]1748}《秉忠定义集》即《平真纪实》,此序即叙《秉忠定义集》之缘起。平真事件,朝廷多有失实之论,曾琦序中云:“浮义相踵几于灭实,子尝有蜀虑者不纪其实,后将何征本末曲折?……吾郡明农大夫凤巢王子、白洞翁子在告、南谷朱子,皆闻之私有咏歌”^{[4]271-272},为了澄清平真事实,蜀中诸君子“以咏歌书诸卷,属予序焉”^{[4]272},交代《秉忠定义集》撰录的目的、过程和内容,对了解此书以及蜀中历史事件有重要作用。

曾琦又有《〈征芒还军图〉序》,记录嘉靖六年(1527)重庆、泸州共同征芒之事。芒,即今云南省镇雄县。他在《改设镇雄府碑记》中,详细记载了明芒部土司之乱以及嘉靖之后平定与安抚芒部之乱的曲折过程:“正德末,酋长陇庆死,无子。二弟寿、政争立,议者归寿,酋不附焉。庆尝约婚乌撒氏女支禄,未娶,至是私于政,因助之争,乌马之赋停辍不供,夺攘矫虔,日益以甚,焚我墩堡,抗我官兵,阨塞我宾旅”^{[4]274},直至嘉靖五年,朝廷才成功改土设流,改府曰镇雄。这有助于了解镇雄的历史和变迁。在对官员任职情况记述中,作者对巴蜀民俗及治理政策也有所记录。如《送兵宪张圭山考绩序》叙述张圭山为川东兵宪三年的政绩,开篇叙述川东地理、民风:“今川东三分巴地有其二,东、南、北三面交于秦、楚、滇、贵之间,山谷阻深,习尚殊异,逋逃无良,往往凭以为暴,若是者十之一。协而之焉,驱而之焉者又有焉。兼之以武卫,联之以土夷,地大务繁,诸执事时省不给爰,设兵宪驻节要地,布皇训以抚治之。”^{[4]249}接着记述张圭山治理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序借为官员考绩,记述了巴东险要的地理特征、彪悍的民风及设兵宪以治的过程,对了解巴东的民俗、政治有重要价值。另有《〈蜀南县绩诗图〉序》,乃为蜀南官员政绩诗图集所作的序,记述《蜀南县绩诗图》著述的经过,讴歌蜀南为政有方、政绩突出者的功绩。

在《都宪行台碑记》中,作者记述了四川资阳地名的来历、地理历史的变迁以及修建过程、发展规模等情况。《江阳完城记》则记述江阳修建完城以护百姓安乐的经过。这些记录有助于巴蜀地方志的建设。

(二)著作序

曾琦的序跋,许多是为巴蜀著作而题,记述了巴蜀著述之丰、文学创作之盛,为研究明代巴蜀文人活动、文学思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川东志〉序》记录了抚巡院修《川东志》的原委、编修总旨及编排体例:“川东当道大夫以志载多阙谬无征,请于巡抚院,命少岷子及诸儒学相与讨论……乃稽于旧志,咨于父老以称物,本诸经史以订误,会诸法式以类次,质于当道大夫、郡邑良吏与诸邦贤以折衷,凡一二越月,麓成编帙,他日重轻疑信何敢知也。”^{[4]264}因曾琦参加了此次编修,故其言为了解此次修撰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可信资料。

《〈乐府余音〉序》是为杨慎之父杨廷和《乐府余音》所撰。杨氏父子乃四川新都人。杨廷和,字介夫,号石斋,明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明中叶名相,历太子太师、大学士、首辅。杨廷和杀伐决断果敢,为政期间诛杀刘瑾,拥立世宗,安邦定国,功不可没。对其功勋、修养及文学,曾琦在序中赞美道:“至危疑急遽之际,除大蠹,定大策,奠安宗社,中外帖然,是难能也。翁经纶宏硕,而德宇温粹,精神折冲,其济也宜。我思绎之,凡厥献替都俞吁咈之余范也。晚年乐府又兼课耕农,劝读诵,称说孝友,沐浴膏泽,黜黜嗜嗜,《卷阿》之余音也。”^{[4]260}所叙事迹与《明史·杨廷和传》所记相同。但《明史·艺文志》未著录杨廷和《乐府余音》,此序对《明史》是一个补充,有助于我们了解杨廷和的诗歌创作。

《序〈古音余〉》是为杨慎门人采录的《古音余》所作。杨慎乃明代第一才子,曾琦与之交往甚密,尤其是杨慎晚年移居泸州之后,两人更是酬答甚欢,甚至一起结成了汐社、紫房诗会等。杨慎博洽多通,洞晓音律,《四库全书总目》评杨慎《古音略例》谓“是书取《易》、《诗》、《礼记》、《楚辞》、老、庄、荀、管诸子有韵之词标为略”^{[10]264},显示其博学。曾琦《序〈古音余〉》评价其“于证音爱其博,于揆义敬其雅”^{[4]251},与《四库全书总目》之论相合。《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杨慎有《古音从目》五卷、《古

音猎要》五卷、《古音余》五卷、《古音附录》一卷,并云:“是四书虽各为卷帙,而核其体例实本一书,特以陆续而成不及待其完备,每得数卷即出问世,故标目各别。”^{[10]364}又著录《古音略例》一卷。然曾琦《序〈古音余〉》云:“予同年友杨子,前通书札云今著《古音略》,将寄予,未至,乃今先得《古音余》一本于方茅朱子,曰:‘是杨子门人董子所采录而就正者。吾欲梓焉。’”^{[4]251}从中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所推断其成书的原因不准确。杨慎关于古音的著作并非全都出自其手,其中多为其门人记录编撰而成,所以内容大致相同,名称各异。杨慎自著名《古音略》,《古音余》、《古音从目》、《古音猎要》等乃门人采录整理而成。

《序〈秋江行卷〉》、《〈送韩飞霞游南中〉序》,对研究熊过、韩飞霞及明代巴蜀文学思潮亦有价值。熊过,字叔仁,号南沙,四川富顺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西蜀四大家”之一,名列“嘉靖八才子”。事列《明史·文苑传》。韩飞霞,泸州人,有隼才,然由于屡试不第,遂弃儒为道,得道成仙,闻名于时,朝廷赐号“抱一守正真人”。杨慎亦有《读余懋昭游青城山诗因寄并韩飞霞》、《赠韩飞霞》诗两首,曾琦与他们交游唱和,有助于了解巴蜀诗人交游及文学思潮。

《〈蜀铎楚韵诗〉序》乃为蜀人张嵩所搜集楚蜀民歌集所作,《蜀铎楚韵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未见著录,已散佚不存。此序对了解楚蜀民间创作有一定的贡献。《〈世德序录〉》、《〈望云遥祝〉序》、《序〈中巴曹氏知录传〉》等,有助于了解巴蜀私家著作之盛况。

(三)关于书院、教育等文化建设

巴蜀文化的发达与其教育、书院等建设有很大关系。《叙黎司训解学职南归》记述临江人黎立轩教授江阳学堂之事,其中记述了他传授的内容及其对巴蜀教育的贡献,“诵诗三百,授之以教……业《易》、业《书》、业《春秋》《礼》《乐》者……教成登用之士倍也,他日养而俟者滋多矣”^{[4]253},有助于了解巴蜀教育文化。

而曾琦关于地方书院的记载则展示了巴蜀教育文化的兴盛。《大益书院记》:“吾省旧无书院,有书院自前督学今大司马浚川王公始……今省城三学生徒盈舍,矧郡邑之秀拔而聚焉,何可胜处?乃度地城东北隅,得之作书院,命曰大益。”^{[4]283}王浚川,即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川,为明“前七子”之一。大益书院,建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今成都书院街即其遗址。曾琦作为当时一地之名士,以大益书院为四川书院之始,对我们研究四川书院的历史亦提供了新的材料。《弘道书院记》、《高明亭记》记泸州嘉靖己丑(1529)建成的弘道书院,皆值得注意。他还有一些关于巴蜀堂室的记载,如《三在草堂记》、《宝石草堂记》等,有助于了解巴蜀人文景观。

综上所述,曾琦作为巴蜀文人,从小为巴蜀文化沾溉,其性格敦朴耿介,刚直好义,又重文章气节,具有巴蜀文人的典型性格特征。其诗文创作多描写巴蜀山水,关怀巴蜀民生疾苦,友爱巴蜀士人,推崇巴蜀前贤,表现出浓郁的巴蜀情怀。而他在文章中,记述了许多巴蜀历史地理的变迁、书院教育文化的发展及巴蜀著述的情况,既展现了明代巴蜀文化发展的盛况,又为研究明代巴蜀文化、文学思潮、文学著述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对巴蜀文化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 黄宗羲. 明文海[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2] 杨钊. 杨慎、曾琦交游考[J]. 文艺评论, 2014(4).

[3] 吕红光. 曾琦其人及其诗歌考论——兼论曾琦与杨慎诗歌之异同[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2).

[4] 曾琦. 少岷先生拾存稿四卷存三卷[G]//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汇刊:34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5]田秀栗,等(修),华国清,施泽久(纂).光緒泸州直隸州志[G]//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32)[M].成都:巴蜀书社,1992.

[6]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7]彭定求,等.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8]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朱彝尊(著),姚祖恩(编).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